



苏诗评点资料汇编

樊庆彦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4FZW030) 研究成果

苏诗评点资料汇编

樊庆彦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诗评点资料汇编/樊庆彦编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209-11894-1

I. ①苏… II. ①樊… III. ①苏轼 (1036-1101) — 宋诗—文学评论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11634 号

苏诗评点资料汇编

SUSHI PINGDIAN ZILIAO HUIBIAN

樊庆彦 编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胡长青

社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65 号

邮编 250002

电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装 济南万方盛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16 开 (165mm × 238mm)

印张 45.25

字数 760 千字

版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11894-1

定价 10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前言

评点是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随文而行，即兴而发，形式不拘一格，较为自由灵活，故而能在唐宋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广泛流行，成为切合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符合国人阅读习惯的批评方式。苏轼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其诗作受到学者和读者们的广泛关注，而成为评点的重点对象。

纵观苏轼诗歌评点的发展历程，自宋迄清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在众多评点者中，当以宋末元初文坛大家刘辰翁为先导。“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点校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于是诗又一变矣。”^①刘辰翁全力作诗歌评点，示人以阅读门径，亦为坊贾借以牟利，曾先后有王十朋纂集、刘辰翁批点《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等元、明多家刻本。刘氏评点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十分自由。但他“论诗评文，往往意取尖新，太伤佻巧”，所批苏诗“大率破碎纤仄”^②，喜于摘句欣赏，三言两语，点到即止，未成理论系统。且前详后略，多平庸之论，偶有发明诗旨可资参考者。

金元时期，虽“北方之士，惟崇眉山有苏氏之学”^③，但由于朝廷享年不永，文人地位特低，这一时期的评点在整个文学批评史中只是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仅有方回所编的《瀛奎律髓》选录苏诗五律一首，七律四十首。方氏的苏诗评点对作品内容与形式技巧均有所涉及，且议论较为细致。他推重江西诗派，因而对苏诗创新求变的一面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评《歧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云：“坡，天人也，作诗不拘法度，而自有深意。”^④评《首夏官舍即事》云：“此诗变体，他人殆难继也。”他

① [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八《罗舜美诗序》。四部丛刊景明成化本。

②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集部一八《须溪集》提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③ [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一《赵复传》，清光绪知服斋丛书本。

④ 本文所引苏诗评语，有些来自曾枣庄主编：《苏诗汇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有些则是笔者从全国各地图书馆所辑苏诗未刊本评语。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对苏诗的用典亦颇有好评。如评《次韵子由五月一日同转对》曰：“兄弟一门，用温大雅事，唐高祖语，极切。”评《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曰：“坡诗不可以律缚，善用事者无不妙，他语意天然者，如此尽十分好。”有关苏诗的用韵，方回也很欣赏，如评《雪后书北台壁》曰：“偶然用韵甚险，而再和尤佳。或谓坡诗律不及古人，然才高气雄，下笔前无古人也。观此雪诗，亦冠绝古今矣。虽王荆公亦心服，屡和不已，终不能压倒。”评《再用韵》曰：“‘尖’‘叉’二字，和得全不吃力，非坡公天才万卷书胸，未易至此。”在方回看来，是因为苏轼才富学瞻，故其诗能别开生面，不同寻常。方回的评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他这种以江西诗派为尊的倾向也招致了不少后人的争议和批驳。

朱明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对思想文化严加控制，文人们不敢有所议论，评点文学亦难形成风气。明初仅出现了刘弘集注的《苏诗摘律》六卷（明天顺五年刻本）。刘弘不仅辑录了类注本中赵次公、李厚、程縡、宋援、林敏公、师尹、孙悼、胡仔、傅藻及赵夔等人对某些诗句的注释，即所谓“类抄诸儒句解于其下”；他自己也对苏诗作以批评与圈点。全书体例是先注后评，所有评注均置于诗后。刘弘对其所评所选颇为自负，以为由此“口诵而玩味”，则苏诗之“堂奥当自得之”^①，然其失眼说错处极多，选评工作做得比较草率，其选评之诗以类注本为底本，该书前三卷所选之诗的顺序与类注本前十六卷相同，后三卷诗排序比较混乱，无甚规律可循。他节录类注本的注语也较为随意，有时甚至曲解其意。其评语的涉及面比较狭窄，几乎未对苏诗的结构、句法、语言等方面作出阐发。故《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该书“不详时代，惟取苏轼集七言律诗注之，潦草殊甚”^②。

明中叶以后，思想禁锢日益减弱，评点也逐渐复兴。万历年间，阎士选两次在山东为官，这与苏轼先后在胶西知密州、登州的情况很相似。为了表彰先贤，勉励自己，阎士选任莱州知府时，将所汇录东坡在胶西任职时所写诗文编为《苏文忠公胶西集》，后任山东按察使时又拾遗补缺，得存完帖。是书前两卷为文，后两卷为诗，其中五言诗三十首，七言诗七十五首，词三首，计一百〇八首。卷首摘录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中所载苏轼于熙宁八年（1075）至熙宁十年（1077）知任密州期间的活动。阎士选在是书卷首序中对苏轼的文名才华推崇备至，“以公高旷超逸，比之为

① [明]刘弘：《苏诗摘律序》，明天顺五年刘氏刻本《苏诗摘律》卷首。

②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集部二七《苏诗摘律》提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白乐天，拟之为李太白”；对他“请郡之特多而立朝之日少”的生平遭遇非常同情；对他为官一任，“匡世救民”“体国恤民”的品节极为赞扬。基于以上认识，阎士选对苏轼那些拯灾救民、关心民瘼的诗歌选录较多，评点较详，对诗题所涉人物、地名作出考释，交代诗的作年作地，为读者提供背景材料，并喜欢引苏轼本集诗文来证释所评之诗。

明代苏诗评本中尚有《东坡诗选》十二卷，袁宏道评，谭元春辑，明天启元年（1621）文盛堂刻本。是书系谭元春据袁宏道评阅本增减而成。卷首谭氏《刊东坡诗选序》云：“斯选也，袁中郎先生有阅本存于家，予得之其子述之。而合诸夙昔之所见，增减焉。”该本选东坡诗七百余首。书眉上载袁宏道、谭元春批语。其评颇精，历来享有盛名。另有张岱评《和陶集》一卷，为明亡后息影山林之作，其《和陶集自序》云：“子瞻喜彭泽诗，必欲和尽乃已，不知《荣木》等篇，何以尚遗什分之二。今余山居无事，借题追和，已尽其数。子瞻云：‘古人无追和古人者，追和古人自子瞻始。’乃今五百年后，又有追和古人者，为之拾遗补缺，子瞻见之得不掀髯一笑乎。”可见张岱不仅评点了陶诗及苏轼的《和陶集》，还将苏轼未和之陶诗追和一遍。张氏为明末清初著名的小品文作家，其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颇受公安、竟陵两派的影响，故其评点苏诗时每每措意于苏轼的缺乏情味，多处批评他性情浮躁，热衷功名，有时甚至言带讥讽。如关于陶诗与苏轼的和陶诗优劣之争，自宋元以来一直争论不已，张氏在对二人诗歌的比较分析中，则呈现出褒陶而贬苏的倾向。

这一时期的苏诗评点本还有沈白辑、陈銓评《东坡诗选》二卷（明刻本），张自烈评《和陶诗》一卷（明崇祯刻本），陈仁锡评《东坡先生诗集》三十二卷（明崇祯陈仁锡刻本）等。受时代风气的感染，明人在文学观念上尊唐黜宋，“文必秦汉，诗必盛唐”^①，对于宋诗大加诋毁，认为苏文优于苏诗。如王世贞在比较苏轼各体作品时就说其“文胜诗”，^②谭元春在《刊东坡诗选序》中亦尝转述他人言曰：“东坡诗不如文。”虽然明末公安、竟陵派力推苏诗，如袁宏道曰：“宋初承晚唐习，诸公多尚昆体，靡弱不足观。至欧公始变而雅正，子瞻集其大成，前掩陶、谢，中凌李、杜，晚跨白、柳，诗道至此极盛。此后遂无复诗矣。”^③但这种声音毕竟是少数，总起来看，此际苏诗评点难掩其备受冷落之局面，与苏文评点的

①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集部二三《怀麓堂集》提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② [明]王世贞撰：《增补艺苑卮言·附录》卷九，明万历十七年武林樵云书舍刻本。

③ [明]袁宏道：《东坡诗选·识语》，[明]袁宏道评，谭元春辑：《东坡诗选》卷首，明天启元年文盛堂刻本。

繁盛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且多为重复宋人旧调，鲜有细致的艺术分析。

清代初期，诗坛即一反明人习弊，大力倡言宋诗，一时蔚成风气：“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①对于苏轼自也是一片褒扬之声，如汪师韩评曰：“轼之器识学问见于政事，发于文章，史称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为之也。”^②达三则云：“有宋苏文忠公，文章气节，照耀千古，虽妇人孺子，莫不知有东坡先生也。”^③因而，“国朝诗人厌薄明代，摹仿唐贤风气，力矫其失，一以清快透脱为宗，而苏诗于是乎盛行。二百年来，家置一编，五尺童子，皆能上口矣”^④。“今三十年来，天下之诗皆宋人之诗，天下之家诵户习皆东坡、放翁之句也。”^⑤清末民初的宋诗派诗人、文论家陈衍认为：“长公之诗，自南宋风行，……二百馀年中，大人先生殆无不濡染及之者。”^⑥

尽管“明自嘉隆以还，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警，故宋人诗集，皮阁不行”^⑦，但“世之訾宋诗者，独于子瞻不敢轻议”^⑧，有些甚至对于苏诗表示出由衷的喜爱，如清人李调元就曾说过：

余雅不好宋诗，而独爱东坡。以其诗声如钟吕，气若江河，不失于腐，亦不流于郢。由其天分高，学力厚，故纵笔所之，无不精警动人。不特在宋无此一家手笔，即置之唐人中，亦无此一家手笔也。^⑨

由此清代不仅兴起了注释苏诗热潮，亦涌现出了众多的苏诗评点本，其中不乏名家，且各有特色。就评点方法来说，有的沿袭元明旧习，喜摘句评赏，如纪昀尝评点《苏文忠公诗集》五十卷，诗中夹评、旁批即是，足见其对苏诗的推崇。有的则侧重于诗颠眉批或诗末总评，除了选评以外，还将注释融于其中，使评与注相互印证，相辅相成，如汪师韩撰《苏

①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集部二六《精华录》提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② [清]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叙》，[清]汪师韩撰：《苏诗选评笺释》卷首，清抄本。

③ [清]达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序》，[清]王文浩辑：《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首，清嘉庆二十四年王氏韵山堂刻本。

④ [清]张崇兰：《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序》，[清]赵克宜辑订：《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首，清咸丰二年丹徒赵氏刻本。

⑤ [清]张世炜：《宋十五家诗删序》，[清]张世炜撰：《秀野山房二集》，道光二年重刊本。

⑥ [清]陈衍：《石遗室文集》卷九《知稼轩诗叙》，1905年武昌刊本。

⑦ [清]宋荦：《漫堂说诗》，清康熙二十七年刻绵津山人诗集附本。

⑧ [清]吴之振：《宋诗钞》卷二十《东坡诗钞》，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清]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清函海本。

诗选评笺释》、赵克宜辑订《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张廷济批校《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在汇注苏诗时，也夹杂有纪评及他自己的评语。就所评内容来说，大多数著作各体皆评，而方东树的《昭昧詹言》注重苏轼七古、七律，温汝能的《东坡和陶合笺》四卷与蒋熏评《东坡和陶诗》一卷则专评苏轼和陶诗。而评点形式亦是多样，查慎行既补注苏诗，又首开清人评点苏诗之风，其《初白庵诗评》选评苏诗四百三十余首，数量为所评历代大诗人之冠。有的则汇录诸家评语，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二十卷，附录三卷，以载纪评为主，间附己评，并选录查慎行及王文诰评注，《东坡和陶合笺》除附录温汝能自己的评语外，还汇辑胡仔、朱熹、刘克庄、樊潜庵、张自立、查慎行等人评释之语。有的精选一家评语，赵克农的《纪评苏诗择粹》十八卷，精选纪昀的评语汇为一集。冯应榴的《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汇录何焯的苏诗评语七十余条。陈句山的《评注苏诗》，翁道芦谓其：“与诸家互有同异，而论特精确。”^①除专门评选苏诗的著作外，尚有大量宋诗选集、诗话、笔记中载有对苏轼具体诗作的评点。《昭昧詹言》融诗评与诗论于一体，其卷一二、二〇评点苏诗一百余首，陈衍的《宋诗精华录》卷二选录苏诗九十二首，其中多数载有他的评语与圈点，典型地反映了同光体诗人对苏诗的一般看法。敕撰《唐宋诗醇》、戴第元《唐宋诗本》、王文濡《宋元明诗评注读本》及曾国藩《读书录》等书中都载有苏诗的评语。另外，冯舒、冯班、钱湘灵、陆貽典、查慎行、何焯、纪昀、许印芳等人评点《瀛奎律髓》时也包含了对所选苏诗的评点。沈德潜编批《宋金元三家诗选》中专辑《苏东坡诗选》，内有赵翼的苏诗评批。张景星、姚培谦与王永祺三人合编的《宋诗别裁》选录苏诗六十三首，其中多有编选者的圈点。

虽然清代涌现出了众多的苏诗选评著作，但多为选录或摘抄查慎行、纪昀两人的批语。查慎行对苏诗评注兼具，其评点主要集中于《初白庵诗评》，最可取者当是对苏诗语言的探讨，尤其是论其平淡与凝练两点极为精辟。他不但注重对某些艺术手法与技巧的分析，还能对其中一些诗的政治思想内涵进行挖掘、阐发，并给予较高的评价，这也是查评苏诗的可取之处。查慎行评注苏诗的成就，使得他的版本广为后人遵循，汪师韩、纪昀评点苏诗就接受过查氏的一些合理意见，尤其是汪师韩，甚至将查评中的一些批语用于自己的点评中，而又能做详细的阐发，寓含己意，内容较

① [清]杨钟义撰集：《雪桥诗话·三集》卷六，求恕斋丛书本。

为翔实。当然，在苏诗诸评中纪昀因其地位、学识而使得其评点《苏文忠公诗集》最为著名。纪评苏诗虽然固守“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但能以文学因革正变的眼光看待苏诗，对其承继唐诗而又力争创新求变的创作倾向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亦能敏锐地认识到苏轼不同阶段的诗风变化，并对苏诗的艺术风格作以精妙的分析，颇能发明一家之旨，昭示后学门径。因而，在诸家苏诗评本中，查慎行与纪昀所评苏诗无疑具有极大的影响，二者评语先后被不少评点者加以过录或转录。

值得注意的是，清人评点苏诗中有许多未刊的手批本，如萧奇中、彭子嘉、翁同龢、顾莼、郭嵩焘、周贞亮、林琴南、黄绍昌、郑珍、杭世骏、张廷济、钱陆灿、何绍基、钱廷锦、严虞惇、王芑孙等人批点皆是，另有管庭芬、蒋生、刘明、□璜、易忠策、鲍倚云、庄缙度、张穆、陈廷表、陈景云、□哲等及不少佚名评点者过录或转录查慎行、纪昀批语。但其中也有彭元瑞、李鸿裔、孙原湘、翁同书、潘奕隽、丁菊泉等署名手批本实为选录或摘抄他人批语。有的是基本上全同纪评，如孙原湘、丁菊泉手批苏诗即是如此。有的是节录其中一部分，如纪评苏诗五十卷，彭元瑞只过录前二十七卷。有的则是选录，如李鸿裔、潘奕隽等手批苏诗，选录查慎行、纪昀、汪师韩等人评语。还有的是通过变换位置、删节等形式进行了某些修改，如翁同书手批苏诗即是如此。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他人评点苏诗进行再评点。如纪昀曾对查评苏诗进行评点，谭元春在其所辑《东坡诗选》中，曾对袁宏道所评苏诗加以评点。而李鸿裔则在评点苏诗的同时，对纪评苏诗也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这一时期之所以产生较多的未刊手批本，原因主要有：一、在此之前的各个时期，一般批点者所批的本子都是常见的本子，藏书家不重视，所以就没有流传下来。二、这一时期更加注重文本保存，比如许多书目中都著录未刊本，而之前的相关书目中就少有提及，这使得许多未刊评本得以保留。三、与明清易代有关，许多文人对于清朝持反对甚至仇视态度，在批语中多有抵触，更易于遭到朝廷的查禁，因此这些评本书商不敢拿出来刊刻。有些已刊刻本也遭到了查禁。四、这些评点并不是为传播而作，他们大多是为了个人的秘玩自赏，甚至是借苏轼作品抒发个人感慨。这种评点严格说来都是文人自赏型的，文人化和私人化色彩很浓，极为符合文人个性，所以随笔涂抹、肆意挥洒个人性情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自赏性的文人化评点，对于提升评点的整体品味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脱离商业化影响，能够全身心地表达真正的自我，可读性和艺术品位都很突出。如萧奇中、杭世骏、何绍基、钱廷锦、李鸿裔等人的评点，其鉴赏力和艺术趣味都很与众不同。他们评点的动机都是源自对于苏轼及其作品的热爱，为其艺术魅力所折

服，何绍基、郑珍还曾批点过两个版本，查慎行、钱廷锦也是批阅多次。评点在这里首先成为一种个体消闲甚至是宣泄情感的需要，其次才是表达个人对作品的理解。这些未刊评点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评点的时间都比较长，由于是出于自赏，所以并不追求一蹴而就，而是反复研读，长时间批点，他们倾注大量甚至毕生精力只是为了在评点过程中获得一种感情上的满足。

总起来看，清人更多地保留了前代评点的一般特点。如评语较为简略，多直觉式的感悟，虽有时也闪烁出一些思想火花，但缺乏逻辑方法所具有的周密严谨性，只有经过一番披沙拣金、爬梳剔抉的工作，方能得出论者之要旨；理论阐述又侧重于艺术分析，对诗歌的遣词造句、修辞手法、结构层次等方面的剖析能够细致入微，深中腠理，但亦时有琐屑细碎之处，而对诗人的写作背景、意图及诗歌的思想内涵亦有所关注，这是与元明文人的苏诗评点相一致的地方。鉴于时代学术风气的转变及所评对象的独特性，清人的苏诗评点较之前人又形成了一些新特色。如大都长于比较研究，既有苏轼自身同类型诗作的比较，又有与前此一切给予过苏诗某些影响的作家作品的比较。与此相联系的是清人评苏诗多喜欢探索苏诗的艺术渊源，虽所侧重的对象并不一致，但正好反映了苏诗博杂、不主一家的特点；又喜欢将诗艺的探讨与经验实证的研究相结合，立论更稳妥、可信。但有些评点者存在着求凿、求深之弊。诗人创作往往即景生情，兴来辞发，寓目辄书，并非完全纪实，也未必字字比兴、言言寓讽，评者不可泥迹而求，呆求死看，处处坐实，亦不可违背诗歌“兴象风神，无方可执”的特征，牵强附会，探究其中深意，而应具有活脱玲珑的鉴赏心理，才能真正领略其中韵味。

二

苏轼的诗歌能够受到众人的喜爱而予以颇多评点，与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密不可分。对于苏诗的评点虽然从宋季就已经开始，但是宋金元明时期的评点者或偏重苏轼其文，或喜于艺术赏析，而较少关注苏诗的思想意蕴，即使涉及也往往浅尝辄止，不够深入，这种状况一直到了清代才有所改观。

苏轼作为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本观念的儒家士大夫，既具有关心人民利益、同情百姓疾苦的人道思想，又充满了维护道义、不惧邪恶的斗争精神，还树立了建功立业、热爱生活的积极人生态度，因此，苏轼提出文学应当是“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

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①。以之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力破当时流行的粉饰现实的“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②，大力提倡“幽忧愤叹之作”，要求“蔼然有治世之音”^③，反映民生疾苦，以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所裨益。可以说，有意识地以议论入诗是苏轼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行之终身的自觉主张。因此，苏轼诗歌创作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尖锐的讽刺和揭露。他曾写下了“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鱼蛮子》）等一系列反映社会现实的篇章，其中有不少诗篇为刺新法扰民而作，批判锋芒常常指向当朝统治者。苏辙谓之：“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④南宋理学家魏了翁对苏诗反映时政的诗史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惟文忠公之诗，盖不徒作，莫非感于兴衰治乱之变。”又曰：“千载而下，诵其诗者，不必身履熙丰祐圣之变，而识世道之升降；不待周旋于熙丰祐圣诸公，而得人品之邪正。”^⑤汪师韩也指出了这一主旨，其评《画鱼歌》云：“时新法盛行，故即‘短钩画水’以为喻。所言‘此意岂复遗鳅鲋’与‘一鱼中刃百鱼惊’者，似皆指新法之病民，王、吕辈坏法乱制，岂异拔诸蒲而乱藻荇哉！其《请罢条例司疏》有云：‘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恐’，正与诗意相同。而其绘事如画，笔端有神，虽寥峭短章，读其词如有千百言在腕下。”而《山村五绝》组诗，则是作者在地方为官时，对于新法在执行过程中所带来的弊端的真实刻画，查慎行亦感同身受，其评其三曰：“此诗亦似讥刺盐法太严而作。”评其四曰：“此诗以讽青苗助役不便也。”可谓一语中的。

苏轼还善于运用诗歌托事寓意的艺术手法，借古讽今，以刺时弊。如《荔枝叹》一诗乃是苏轼贬官岭南时所作，作者由惠州荔枝生发，批判汉、唐进贡荔枝的弊端，指斥当朝权贵贡茶贡花、争新买宠的丑恶行径，进而提出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理想，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查慎行看到了这首诗内在的真精神，更对诗中后半部分直刺时事、略无隐避之笔深有感触：“耳闻目见，无不可供我挥霍者。乐天讽喻诸作，不过就题还题，那得如许开拓。”而作者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亦使得纪昀情不自禁地赞美

① [宋]苏轼：《龟峰先生诗集后》，[宋]郎晔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六《叙》，四部丛刊景宋本。

② [宋]苏轼：《上欧阳内翰书》，[宋]郎晔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一《书》，四部丛刊景宋本。

③ [宋]苏轼：《东坡集》卷二四《王定国诗集叙》，明成化本。

④ [宋]苏辙：《栾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四部丛刊景明嘉靖蜀藩活字本。

⑤ [宋]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程氏东坡诗谱序》，四部丛刊景宋本。

道：“自此以下，百端交集，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不可以已而语，斯为至言！”又如《鱼蛮子》乃是苏轼批评新法之不便，尤其是诗末云：“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空虚未可知，会当算舟车。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写出了逃税渔民的悲苦遭遇，也揭示出地租盘剥的残酷性，汪师韩评曰：“分明指新法病民，出赋租者不如鱼蛮之乐也。忽又念及‘算舟车’者，笔下风生凛凛。”查慎行亦感叹曰：“主新法者闻之，当奈何！”桑大夫指汉代桑弘羊，武帝时为大农丞，善于筹财，汉代“算舟车”从他和孔仅等开始，这里泛指征收赋税的官吏。诗作表现出渔民难以承受沉重赋税，一直不敢听到“桑大夫”这三个字。萧奇中对此则进一步指出：“古在桑大夫矣，今何甚。”刺时讥世之意昭昭在目。而且汪师韩在评点苏诗时还善于正话反说，借机流露出对社会的批判。如其评《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云：“轼以诗狱谪黄州，辙亦谪筠州监盐酒税，相见宜不胜感怆者。而诗云‘吾侪流落岂天意，自坐迂阔非人挤’，诗人忠厚之言。”所谓“非人挤”，实指“人挤”，苏轼本是借喻社会之不公，可谓寓意深刻。而经汪氏之口反说出来，与其说是忠厚之言，毋宁说是愤世之语，更显诗歌立意之尤。又如其评《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云：“职役之劳与夫妨农病民之实，历历如绘。所以指陈得失，有《国风》《小雅》之遗。其云‘羨长卿’而‘愧渊明’，特托言耳。”苏轼此诗讥刺朝廷开运盐河不当，又妨农事，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汪氏以为有《国风》《小雅》遗风，称苏轼钦羨居官无事的司马相如与及时归隐的陶渊明，实为激愤之时的反语，可谓入木三分。

苏轼自幼深受儒家仁政观念影响，一生忠君爱民，宋神宗即云：“苏轼终是爱君。”^①清人汪师韩甚为服膺，如他评点苏轼《郊祀庆成诗》云：“诗共十四韵，而自‘可颂非天德’以下俱作箴规之语，此所谓因事纳规，不藉扬厉铺张以矜其华藻。”在评《赠写御容妙善师》时亦云：“诗虽为妙善而作，而意则眷恋先皇，无句不是惓惓忠爱之诚。此即轼所谓‘发乎情止乎忠孝’，而不仅‘止乎礼义’也。”但苏轼生逢冗官冗费、积弱积贫的宋代，也同其他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士仁人一样，济世理想与经国宏愿往往被社会现实所粉碎。当儒家的社会价值取向无法实现时，苏轼只好到释、道之境中重新思考和评价人生。汪师韩也注意到苏轼所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如《韩子华石淙庄》是称颂韩绛能急流勇退的诗，汪氏评此诗说：“此盖嫉世之贪位冒禄者。轼通《道藏》，又尝撰《广

① [清]沈雄编纂：《古今词话》“词评”卷上，清康熙刻本。

成子解》，故有取乎老庄知足不辱之旨，非为韩絳有手疏之词，遂顺其意而称道之也。”而其评《秀州僧本莹静照堂》云：“厌事人无事更悲，说来绝倒。即就起动相以证真谛之寂然，何必坐断千崖，乃得慧眼无见。”此却是针对苏轼的禅学思想而发。苏轼不同于他人之处在于他能够深入儒、道、释三家典籍，并灵活运用于人生，故能以旷达的态度自我解脱，面对种种坎坷而应付裕如，无论仕宦沉浮，始终未失其本色，这也受到了评点者的称赞。如《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云：“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对自己获释颇有不以得失为怀之意。汪师韩禁不住感叹：“诗狱甫解，又矜‘诗笔如神’，殆是豪气未尽除。”

纪昀对于苏轼的宦海浮沉颇多感慨，对其生平遭际深表同情，他多次点出此类苏诗创作的寓意。如评《纵笔》“此诗无所讥讽，竟亦贾祸，盖失意之人作旷达语，正是极牢骚耳。”《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第二首》乃是苏轼“居下僚而不得志，愤激而为立功边外之思，郁郁时实有此想”，故而，“骤看若不相属也。‘屋庐深’三字入神”。另如其评《荆州十首》其八曰：“寓多材为累之感。”评《礞溪石》曰：“借写仕宦之劳，浑然无迹。”评《东湖》曰：“纯寓牢骚。”评《秦穆公墓》云：“纯寓与上官不合之感，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但与查慎行、汪师韩充分肯定苏轼的政治诗不同的是，纪昀作为清朝重臣，为维护封建统治，极力推阐“温柔敦厚”之诗教：

余谓西河卜子，传诗于尼山者也，《大序》一篇，确有授受，不比诸篇小序，为经师递有加增。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实探风雅之本源。后人各明一义，渐失其宗。^①

故而，纪昀论诗，反对一切逾越“礼义”界限的创作倾向：“要当以不涉怨尤之怀，不伤忠孝之旨，为诗之正轨。”^② 所以他在评点苏诗时对其讽刺之作屡屡生发不满，并一再强调：“激愤太甚，宜其招尤。即以诗品言之，亦殊非温柔之旨。”（《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评语）“惟激讦处太多，非诗品耳。”（《送刘道原归觐南康》评语）“讥刺太多，自是东坡大病。然但多排诋权倖之言，而无一毫怨谤君父之意，是其根本不坏处，所

① [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文卷九《云林诗钞序》，清嘉庆十七年纪树馨刻本。

② [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文卷九《月山诗集序》，清嘉庆十七年纪树馨刻本。

以能传于后世也。”（《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评语）但纪昀也不是一概反对讥刺：“古人虽不废讽刺，而皆心平气和，乃不失风人之旨。”（《张安道见示近诗》评语）只有“愤懣而出于和平”（《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评语），方符合“温柔敦厚”之诗教。故而他认为《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与《涡口》诗同刺小人排抑，然俱不露，所以为佳。”并进一步指出“虽不废讽刺，而心平气和”之方法，乃在于用“比”，“寓刺却不甚露，好在比而不赋”（《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前二首评语）。如《寄刘孝叔》通篇讽刺新法，但作者却善于以比论事，其中“平生学问只流俗，众里笙竽谁比数，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之句，乃是借用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之事，内含不与新法同流合污之意，如此处理便显得语气委婉而内蕴锋芒，因而纪昀评曰：“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痕。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如果就苏诗某些篇章存在的形象性薄弱之病来看，纪评此种“太露”“太激”的针砭亦可谓有见地。

苏轼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反对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除了思想内容以外，还包含有表现方法的一面。他认为创作须有真实感受，“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①，应该直抒胸臆，“言发于心而冲于口”^②。在他的很多诗文中，都以感情是否真实作为评价的标准。如他特别推崇陶渊明，就因为陶诗情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和陶渊明饮酒》）苏诗中有许多发自肺腑、充满身世之感或兄弟情深的篇章，都为评者所称道。如《游金山寺》，其中“闻道潮头一丈高……江南江北青山多”句，张廷济评曰：“就江心所见，见世路之变幻，与杜《渼陂行》同”；萧奇中评曰：“茫茫逼真”。“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句，何焯评曰：“予尝登韬光绝顶观日初升，见湖中红灯二盏出水面，徙转无定。此境非身历者不知也。”王文诰评《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曰：“通篇悉出兄弟至情。”严虞惇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首寄之》曰：“真情苦语，令我心恻。”而其中“苦寒念尔衣裳薄”句，更“使人友爱之心，油然而生”（张廷济评语）。杭世骏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曰：“坡与子由诸作，意思绵邈，情生于文，味之亹亹不尽，未尝求工于字句，即此三诗，可以隅

① [宋]苏轼：《江行唱和集叙》，[宋]郎晔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六《叙》，四部丛刊景宋本。

② [宋]苏轼：《思堂记》，[宋]汤汉选：《绝妙古今》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反。”汪师韩评《次韵李公择梅花》曰：“胸次勃郁，随处激发，其言感饥贫，念羁旅，如无当于梅花，触绪濡毫，忽深感慨，固知文必本于情也。”

但是苏轼又强调“非勉强所为之文也”，“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而已，何足为损益”^①。即不要为文而造情，而应取其自然，缘情而发：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②

汪师韩对于此论颇有同感，如《答吕梁仲屯田》是一首写徐州防洪的诗篇，其中有“旋呼歌舞杂诙笑，不惜饮醺空瓶盆”之句。何焯批评说：“诗宜殷忧惻怛，一入歌舞行乐，便伤体裁。此才人失检处。”亦有人认为：“不于此时殷忧惻怛，而以行乐为言，似为失体。”但汪师韩则持相反意见：“然此语乃在河复之后，幸得免为鱼鼃，因而饮醺，固是人情所有。正见其率真，不作妄语，岂比后之矫情自饰者，对人作凄怆之词，而实于民事漠不加意者耶？”

苏轼作为朝廷大臣，必然要有许多官场应酬、人情交往，为此写作了不少酬和诗，而且他在政治失意后，更从佛学中寻求慰藉，写下了许多禅偈诗，这些诗很难说是真正“发乎情”而作。因而，评者在强调“发乎情”的同时，也对“为文造情”的倾向提出了批判。纪昀明确反对写空洞无物的应酬诗，反对写往复不已的和韵诗，反对写故意逞才的窄韵诗，反对写空疏无当的禅偈诗。他认为《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三首皆排宕兀傲，奇气纵横，妙俱从自己现境生情，不作应酬泛语。凡和诗最忌作应酬，人与己两无涉。”但苏诗卷二十九乃是作者任职翰林时之作：“居富贵者多应酬，其间为文造情，殆亦不少。”^③纪昀在其后的总评中也说：“此卷多冗杂潦倒之作，始知木天玉署之中，征逐交游，扰人清思不少。虽以东坡之才，亦不能于酒食场中吐烟霞语也。”苏轼也注意到这一毛病，指出“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鄮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事

① [宋]苏轼：《答李端叔书》，[宋]郎晔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七《书》，四部丛刊景宋本。

② [宋]苏轼：《江行唱和集叙》，[宋]郎晔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六《叙》，四部丛刊景宋本。

③ [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文卷九《月山诗集序》，清嘉庆十七年纪树馨刻本。

实上，艺术作品的品目，除了作者的情感表达，还在于意境之营造。故而他也强调：“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尽，尤为极致。”又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① 只有主体情意做到了充分准确的表达，才能达到一种回味而高妙的艺术境界。在评者看来，苏轼于此确实有所改进，“此种诗平浅浑浩，笔游天外，少陵却未开此境”（《石鼻城》何绍基评语），“五百字一气相生，不见窘束，亦不见纷杂，笔力殊不可及”（《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郿、郿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纪昀评语）。

但即便是同样“工”于物体的作品，在苏轼看来也有开掘深浅之别：

司空图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阴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②

杜甫的《倦夜》透露出诗人“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的忧国忧民的悲凉感慨，境界也较之司空图的两首诗高超许多。因此，苏轼认为作诗应该像杜甫一样注重托物兴寄：“原子美之意，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亦六义之比兴、《离骚》之法欤？”^③ 这是主体心境与客体物境的天然凑泊，即情与景合，意与境会。他的诗作如《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纯以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深微，后半尤烟波跌宕，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亦不能”（纪昀评语）便是“因感微物，以寄妙理”^④，意婉而旨远，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文化人格与审美理想。

苏诗题材广阔，内涵丰富。通过苏诗评点，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家国的真挚情谊，也让我们了解到苏轼对于文学创作的深刻认识与独到见解。同样，这些评点也成为各种文学观点的“试金石”，为展现苏

① [宋]何道撰：《春渚纪闻》卷六《东坡事类》，明津逮秘书本。

② [宋]苏轼：《书司空图诗》，[宋]张鑑：《仕学规范》卷三八，宋刻本。

③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九《辨杜子美杜鵑诗》，明刻本。

④ [宋]苏轼：《东坡续集》卷七《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六十四，明成化本。